

大礼堂见证人民当家做主

杨建峰

太原五一广场西北侧的山西饭店，原名自省堂，后改为人民大礼堂，曾是太原市政治集会中心，见证了太原的新生、审判日本战犯等重大历史事件。

自省堂，建于1919年，坐南朝北，南北长60米，东西宽27米，正面面阔五大间，中三间为带尖圆拱顶门洞，有四根装饰性砖雕大柱支撑，两边面上部开两个大圆玻璃窗。是省城当年最具规模的礼堂，有1000多个座位。曾有不少著名人物在这里演说、作报告。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自省堂为军管会接管。解放伊始，太原市军管会邀请各界人士和代表在这里开会，宣布了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布告。签发这份布告的是军管会主任徐向前和副主任罗瑞卿、赖若愚、胡耀邦，由赖若愚亲自颁布。会后，全市广泛张贴。从5月1日开始，军管会在此先后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有文化界座谈会、工商界座谈会等，向各界代表阐述党的政策并征求意见。5月22日，经过一段时间筹备的太原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召开，有各界代表213人参加。到新中国成立时，军管会、市政府在此先后召开五次全代会，参加会议的领导人有程子华、赖若愚、裴丽生、王世英、陶鲁笳等。赖若愚作了《新山西建设方针与任务》的报告。

1950年，自省堂改名为人民大礼堂，俗称海子边大礼堂。

1956年6月中旬，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大礼堂专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挂牌），公开审理太原监狱在押的八名侵华日军战犯，历时一个月。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时期，人民大礼堂一直是太原市政治集会中心。一直到太原工人文化宫（南宫）和湖滨戏院建成以后，人民大礼堂的会议功能才渐渐失去。

进入新世纪后，大礼堂原址经过改扩建，成为一座多功能的现代化饭店，名称改为“山西饭店”。

红色记忆



忻州吃糕

米广弘

过去人们总盼着过年，重要原因一是能吃好的。吃什么好？饺子当然排在第一，油糕，应该第二。

那会儿物质匮乏，吃什么都香。在天天吃玉米窝头的时候，除了白面之外，能吃上一两顿黍子糕，甭提多幸福了。

黍子，耐贫瘠、抗干旱，是中华五谷之一，早在《诗经》就有记载。黍子剥皮后，因其米粒金黄故而叫黄米。黄米磨成面粉兑上温水用手搓揉，拌成糕粉上笼蒸熟，就是我们祖辈辈吃的黄糕，也称油糕。

油糕是忻州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耐饥美食，将软黄米蒸熟，趁热揉成黄米糕，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放入滚烫的热油中烹炸，几分钟后即裹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外衣。

事实上，糕是个好东西，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直链淀粉含量少，营养丰富。山西民间有“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十里的稠粥饿断腰”的说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糕营养好、耐消化，是寻常百姓干活的理想食品。

糕有“高升旺长”“步步高升”等吉祥寓意，因此每逢庆生婚宴、乔迁新居、过年过节等各种重要宴席，油糕是少不了的美食。这油糕，是先把蒸熟的黄糕包上糕馅。一般要包成长、圆两种造型，长的包菜馅，圆的包豆沙，寓意阴阳相随、日月相伴、长久高升。等胡麻油烧开后，再将包好的糕下锅，炸至金黄。这样的炸糕，吃起来外脆里糯、香甜可口，简直是人间美味！想想都流口水！

在忻州，许多人酷爱吃糕，除枣糕外大多数主要吃不包馅的素糕，可直接蘸白糖。吃糕需要有仪式，或点好菜，或炖肉骨，或炒鸡蛋，或大烩菜……总之，菜要比糕软和一点点，菜随糕走，顺口下肚。吃起来狼吞虎咽，咽下去咕咕有声，才是一个吃糕的样子。

困难时期，没有黄糕，咋办？这难不倒会吃的忻州人，杂粮之都不缺物产，那就吃高粱糕、玉米糕，再不成打玉米面糕、莜面拿糕也行，还有把蒸馒头用的面擀成厚圆片，上、中、下三片一组，圆片外缘之间镶嵌红枣，蒸熟即是花糕。只要是吃糕，就叫人满足，令人陶醉。

糕，吃的是福糕、寿糕、喜糕，人们在欢天喜地的热烈氛围中祈福、接福、纳福、惜福，日月流转，岁序更迭，糕，承载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晋之味

图片来源百度

清明前的“一百五”

郝妙海

快到清明了。在我的家乡晋源地区，将清明前一日称作“圪夹日”，而将清明前二日称作“一百五”。

如果追根溯源，家乡的“一百五”，应该源自一个远比清明节发源早、说道多、且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山西民间更加普遍而隆重的节日——寒食。从一些典籍的记载中，似乎都可见端倪。南朝梁宗懔在其《荆楚岁时记》中即云：“去冬节一百五日……谓之寒食，禁火三日。”在汉末曹操发布的《明府令》中也提到：“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东晋人陆翙所著《邺中记》也记载：“俗冬至后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以上说法，似乎都是以上年冬至为准，说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五日为寒食。地方史学者刘大鹏先生在其日记中也多次记道：“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吾乡以前二日为寒食节……”这样，“寒食”“清明前两日”“一百五”三个日子便很自然地合而为一了。

我曾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发现在百年之内，冬至后第一百零五日，或是清明当天，或是后一日、后两日，唯独没有一年是前二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传说寒食节起源于春秋，是为纪念介子推。关于寒食节起源于介子推在介休绵山被焚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汉桓谭《新论·卷十一·离事》。到唐时，清明作为一个节日在民间已被广泛接受。由于清明和寒食这两个日子屡有冲突，为有所区别，有些地方便将寒食节固定在了清明前两日（有些地方是前一天）。但由于习惯使然，仍有人将其称作“一百五”。然而，寒食和清明这两个日子还是离得太近了，经多年演变后，清明节在民间的分量越来越重，而寒食节，却慢慢地很少有人提及了。

然而，那个“一百五”，却与“圪夹日”一样，在有些地区，如我的家乡，作为清明节的一个附属日子，被保留下来了。

在晋源地区，不仅节日的名称变了，而且节俗的内容（寒食节的节俗主要是禁火、冷食）也变了。这一天，当地的主要习俗是“上新坟”。刘大鹏先生在1915年2月20日的日记中即写道：“本月二十二日为清明节……吾乡以前二日为一百五，有新丧三年者即于一百五上坟祭烧。”境内此俗至今未变。家中有老人新丧者，家人三年内必于“一百五”这天上坟（顺便即将旧坟也祭扫了）。由于是新丧，这三年的祭扫比当年的清明要隆重得多。不仅丧者的直系晚辈，包括出嫁的女儿、孙女要全部参与，一些近本家、近亲属的晚辈也要参与。当然祭品也格外丰盛一些，祭扫后全体参与者会聚餐一顿。上新坟时，境内讲究剪的纸钱不能成串，必须是散钱。若有些人家需迁葬老坟，也会选在此日进行。

除此以外，“一百五”在境内有些村还被称作是“挖窟窟”的日子。其意有二：一是女孩子可选在这天打耳朵眼，以穿吊耳环耳坠，据说在这天打耳朵眼不会发炎；二是在这一天“安茅子（即挖坑安放茅食）”。旧日，农村起房盖屋只要择吉日即可开工，唯独安茅子须在“一百五”这一天才可行。如果恰逢这一天有各种原因不能进行，也要先供献一番，并象征性地在安茅盆处挖两锹，日后就可以随时进行了（境内金胜一带是在“圪夹日”，即清明前一日“安茅子”，足见十里乡俗不一般）。同样，如果有人准备在年内拆旧房盖新房，也须在这一天将旧房拆几块砖以示动工。其后哪一天开拆，就无顾忌了。



郭象声槩括新诗

马斗全

1939年，山西著名学者、书法家、教育家郭象声，也是一位诗人，有《长相思》一诗，序云：“阅报有近人白话诗一篇，戏以韵语槩括之，用古乐府《长相思》为题。按诗家制题之例，应曰当古乐府某某篇，然今人久不晓此例矣。”槩括，意为就原有的文章、著作剪裁改写。其诗为：

沉沉夜漏永，都在僵眠中。孤灯不成寐，惟有欢思依。月光射窗户，不碍玻璃风。照见欢热闹，满面珠溶溶。无聊似有恨，所恨知何从。高楼垂柳外，一片灯光红。水纹相荡漾，灯影相迷蒙。池边蛙阁阁，鼓吹音不同。只增萧寥味，难辨私与公。明月欲招欢，广寒仙人宫。清凉散一眼，无补欢遭逢。悠悠可憎夜，直至天明终。明月可怜月，入夜仍悬空。欢见月圆缺，不见嫦娥容。将侬比嫦娥，欢意谁为浓。遥遥代欢想，正在心酸中。思侬惟有欢，知欢惟有侬。

他所槩括的那首白话诗为《夜深了》：

夜深了，人们多同船骸似的静卧，可怜那陪着孤灯的伊，长思着伊的爱人瑛。

明月穿入了玻璃窗，照透了青年的热心。泪痕满面的青年啊，你在楼上恨的是谁？

柳外高楼的灯光，照着闪动的波纹；池里不住声的蛙儿，唱着不同音调的歌；明月在水中叫我：快来！和我尝这凉味！

死了的夜，直死到天明；落下的月，明夕又挂在天空；啊，无复姮娥影，空留明月辉。是多么叫伊心酸的事！

这首白话诗的作者不知是谁，只知发表在当时的报

刊上。郭象声的槩括诗，存于他的《己卯诗抄》中。两相比较，无疑是韵语《长相思》好读而有意味。

在《己卯诗抄》中，郭氏还有《秋江槩括报章新体诗》一首：

芦花如雪雁飞来，蓝色天空一线排。

带月南征声不绝，江干有客梦初回。

所槩括的白话诗为《秋江》：

江面白如雪有雁飞来了

好蓝的天空留得了夏夏谁能记得清划上一道痕

一身月光披好忙的旅程甚么时候了还飞向南去

梦在低声唱秋风动江干

老翁呓语了

郭象声槩括诗后自记道：“近人新体白话诗，句度不齐，废韵不押，犹可说也。有如此篇，句法皆用五字，何以亦不押韵耶？戏为改成一绝，不过二十八字，将其六十五字所说包举无遗。可见旧诗容易之至，今之人自走魔道耳。”又记：“蓼乃红色花，安得如雪？故不用其原文，而曰芦花。”

郭象声的两首槩括诗，实是他对当时已倡行20来年的新体白话诗的不赞成态度。但他没有像某些提倡新诗的人那样，以一种强加于人的观点乃至激烈的语言要求打倒一种诗体，而是平和地两相比较，希望以事实来说明问题，显示了旧文人的敦厚习性。他的这种比较，可为20世纪诗歌史之资料。80多年后，我们再回头来看他的比较，似乎更有意义，也更能发人深思。

锦绣太原·人物篇③



在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中记载了五位名传千古的悲情英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豫让喊出的那句名言“士为知己者死”世代流传，其捐躯之处就在晋源区赤桥村的豫让桥。

豫让，长治人，春秋时期晋国智伯的臣属。公元前453年，智伯被赵、韩、魏所灭，赵襄子因为智伯生前经常公开侮辱他，并且逼迫他退守晋阳，坚持了异常艰苦的晋阳保卫战，对智伯恨之入骨。消灭掉智伯后，把智伯的头颅做成酒具，每日用来喝酒。豫让作为智伯的臣一心要为主公报仇，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就化装为罪人，怀揣匕首，混到赵襄子的宫室中充当打扫厕所的杂役。在赵襄子上厕所时刺杀未遂被抓获。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赵襄子念其是个义士，于是让手下放了豫让。之后豫让用漆涂身，弄成满身瘢疮，又吞下火炭，弄哑嗓音。之后在街市上乞讨，以伺机刺赵襄子。结发妻子遇见他也认不出来。路上被朋友认出，朋友流泪说：“为何不委身于赵家伺机杀之？何苦如此自残形体？”豫让说：“我若委身赵家为臣，再去行刺，就是怀有二心，那样做是不忠不义。”二人分手后不久，赵襄子出行的时候，豫让埋伏在赵襄子经过的桥下面。赵襄子到了桥上，马惊了，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派人将豫让抓了起来。赵襄子责备豫让：“你不是也曾臣事过范、中行氏吗？智伯全都灭掉了他们，可你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臣事智伯。智伯也已经死了，你为什么唯独为他如此报仇呢？”豫让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豫让知道生还无望，无法完成刺杀赵襄子的誓言了。就请求赵襄子把衣服脱下一件，让他象征性地刺杀。赵襄子满足了他这个要求，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豫让拔出宝剑多次跳起来刺击赵襄子的衣服后，仰天大呼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说完后自杀而死。

豫让的这种行为，源于周初德治思想。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时实施以德治天下，制定礼乐制度确保“德政”的实施，同时实行严格的宗法制维护社会秩序，以达到“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忠义永存、礼乐长久”的理想社会。到春秋时，这种理想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流思想，忠义的观念是士人的必修课，某种程度成为一些优秀士大夫的毕生追求。豫让这种忠义行为，是春秋道德、观念、标准的表现，是当时世人学习的榜样。

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流传久远，成为古晋阳忠义文化的代表之一。查找资料，看到了这样一段：“关于赤桥之名的由来，一说是赵襄子在智伯渠上修建了一座石桥，因为水灌晋阳之故，反用五行相克说，以火克水，取名赤桥。另说见旧《山西通志》：“初名豫让桥，宋大祖凿卧虎山，水流成河，更名。”桥西观音庙，原供奉着豫让塑像，门外南侧墙上，嵌清康熙年间知县殷峰所作的豫让桥诗一首：“卧波虹影欲惊鷺，此地曾闻手植愁。山雨往来时涨涸，岸花开放自春秋。家鼎已三分裂，志士恩凭一剑酬。返照石栏如有字，二心臣子莫径由。”如此述说，那座小庙是观音庙了。

中华民族的忠诚、信义是世代传承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道德根基。豫让桥在历史上成为士大夫阶层瞻仰、凭吊之处。唐人胡曾《豫让桥》：“豫让酬恩岁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时国士心？”明代计东《豫让桥》：“秋尽蓬山惨不骄，流泉夹岸夕阳遥。伤心国士酬恩地，瘦马单衫豫让桥。”

发现蒙山大佛的文史研究学者王剑霓老人在查阅《吕氏春秋》时发现相关记载：“赵襄子游于囿中至于渠，梁下豫让寐，佯为死人。”王剑霓老人经过详细地实地考察后认为文内“赵襄子游于囿中至于渠”的“渠”是古代帝王饲养鸟兽的园林。三家分晋后，赵襄子初定赵国首都为晋阳，供其游猎玩乐的园林“囿”就在现今太原市赤桥村。赵襄子“至于渠”，其“渠”是智伯决水灌晋阳城时所开掘的水渠，后人亦称“智伯渠”，其“梁”就是赵襄子在智伯渠上修建的桥。王剑霓老人认为此文恰好填补了《史记》和《战国策》的空白，明确了豫让行刺赵襄子的确切地址就是太原赤桥村的豫让桥。

有古城遗址，传说为庞涓驻守之城，且留有“庞涓斩子”的传说。其实这座古城遗址，正是当年的中阳县，也就是后来秦汉时期的中阳县。汉代《水经》记载：“又南，过中阳县西。”其实指的是汉时期的中阳县。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注：“中阳县故城在东，东翼汾水，隔越重山，不滨于河也。”这指的却是东迁至今孝义的中阳县。唐代李贤注《后汉书》中：“中阳县，属西河郡，今汾州孝义县也。”指的也是东迁之后的中阳县。

那唐代中阳县又去哪了？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因割梁山地区的“山胡”，其中最为强大的就是占据旧中阳县境地的“离石胡”，在旧境设置了平夷县，就是今天中阳县的前身。迁移至孝义的中阳县已废。直到金代明昌六年（1195），这个名字才大于露骨，女真统治者将其改为“宁乡县”。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了1914年，因为“宁乡”和与别的省份县名相同，便又改回古称“中阳县”，一直沿用至今。就是因为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且县境不同的“中阳县”，所以很多人都混淆了。汉代的中阳县和北魏时期的中阳县根本不在一个地方，包括《孝义县志》中对于中阳县地名的解析，依旧是按照当年东迁孝义的中阳县：“汾水之阳，是邑中处，故名中阳。”其实这个名字的起源，早在春秋就有了中阳县。这也就是中阳非彼中阳，汉中阳非魏中阳。

《水经注》里的中阳县

晓寒

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描述山西中阳县时，用了“中阳县故城在东，东翼汾水，隔越重山”的描述。这个位置，指的是今天的孝义城区，难道郦道元弄错了？还是怎么回事？

山西省的中阳县，东与孝义市交界。现在的中阳县城到孝义市区距离有60多公里，而在郦道元所在的北魏年间，中阳县治就是在今天的孝义城区。怎么回事？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征讨四方。降服南匈奴、乌桓及鲜卑等少数民族，统一了黄河流域北方大片疆域。为了进一步巩固管理，将山西拥有大量田产的“豪右”迁移至邺城，同时也补充了邺城因战乱丧失的人口。可山西这边将人口迁移走了，就需要有人来补充。

况且这里是抵御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要地，于是将南下的南匈奴分为五部，安置于山西中西部，承担起联防御北方的义务。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则被召至邺城。在庞家村东

作为人质，防止叛乱，要知道当年内迁进来的约有近20万人之多。东汉末年的中阳县，就是在这个时候腾出地方给南匈奴。县治迁移到今天的孝义，而孝义当时还没有置县，到北魏太和年间（477-499）才在今市辖区东六里处置永安县。唐贞观元年（627），因县名与涪州永安县（今重庆市奉节）重名，时邑人郑兴孝行闻于朝，唐太宗敕赐名为“孝义县”。旧中阳县则并入离石，为南迁胡人所居。旧中阳县又在哪